

吾乡风物

在城市的边缘疯狂试探

陈思呈

最南方

有段时间，我总在广州与佛山交界一带徒步。便出现了幻觉，幻觉自己踏出的每一步，都在描摹，乃至勾勒城市的边界线。确实有两次，我们遇到了两块界碑。怎么说呢，也没有很多，有就行了。

有一次是在南激村。南激村正在改造，墙上和桥栏贴着标语“政策时过境迁，旧改机遇不再等”，内容紧迫但语气悠闲，可能因为那个时钟描写得太生动了。

水涌边很多人家可谓豪宅，门廊多是宝瓶栏杆加白瓷砖的经典搭配，这是90年代后民居时尚的欧风构件。有些人家的院子里晒着蕉皮。我乡有个著名民间传说，“老坏人”向“猪哥精”借一块正在晒着的蕉皮，因为他要上厕所，忘记带手纸。猪哥精不肯借，老坏人就开展了报复计划，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在这里遇到蕉皮，我深感亲切，但不明其意。

一户人家在门口的围栏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字条，谆谆教导：“不准甩快递进去，要放好！”让人联想到快递员把包裹潇洒一扔，它进院子的那个抛物线。不免担忧这纸条倒给了人启发和灵感。

我们走到江边，江边有两口子正在钓鱼，界碑就在他们身后。

界碑周围的地面有青苔，微滑，很可能是涨水时，这块地被江水泡过。而且这块地有轻微地倾斜，所以，如果我脚底一滑，这块地就会形成一个天然的滑梯，直接把我送向江水。

正钓着鱼的两口子严厉地提醒我们不要走这么快。后来那位妻子站起来时，我不安地发现她的腿有点残疾。

我们如此急趋，是见到界碑很兴奋。为什么兴奋，后面我再讲。当然实际上界碑长得也就那样，平平无奇，四面刻的字分别是“广州市界”“中华民国十九年立”“市区界石毁窃严究”“以河中心线为界”。

有意思的是，旁边水泥台阶上潦草地刻了几个手写字：2000年壹月七日立。刻痕很浅，不细看都注意不到。数字写法不规范。书法水平呢，感觉是碑重新立起来后，有个热心村民，趁着水泥未干为历史记录一笔。

查了资料才知真有其事。这界碑原来在江水中，到2000年1月向前移动了10米。资料中说，1928年前后广州共建46方水陆界碑，南激村这一块是最南的

一块，也是唯一与今天的广州市界重合的一块。

也就是说，即便是今天，此时，当我站在那块又滑又斜的青苔地面时，我确实也是站在广州的边界线上。确实是站在广州的最南端。

石围塘

此后我萌发了多看几块界碑的念头，但截止到发文此时，也只再见过一块。

但那是公认的现存广州界碑中最难找得到的一块。

去年冬天最冷的那一天，我们在石围塘看废弃的火车站，码头，还有铁轨。这一片区域，要比南激村破落很多很多。每次我举起手机拍树或者任何建筑，镜头前都会出现大量交错的电线。路上随意漫步着很多狗，神色不安，看起来介于流浪狗和看门狗之间，让人有双重的担心，一方面担心它们会受到人类的伤害，一方面担心人类会受到它们的伤害。

在南激村，我只看到人们晾晒乌腊蕉皮，但在石围塘，晾晒的事物却并不只限于以下：米饭（还特别多）、青菜（倒挂在衣架上）、腊肉（也挂在衣架上）、鞋子（晾在窗格子上）、棉被、衣服、废弃的铝制门框。可以想象，在另外的季节，无疑还会晾晒陈皮、木棉花、鸡蛋花和一切。

石围塘确实是一个充满韵味的地方。但最让我难忘的，不是遍布半空的电线，不是古老的铁路和车站，也不是地上晾晒的米饭，而是那些破旧又巨大的仓库。

三甲仓、门道茶仓、湖北省对外经济贸易厅驻广州办事处石围塘仓库、广西对外经济贸易广州公司塞坝口仓库……还有的在大门口贴四个大字：省属国企。我不知道它们现在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功用，但我知道它们还有用。因为门口还有值班室，还有“交通劝导岗”，还有门卫拦着不让我们进去看一看。

整个石围塘很安静，这些古旧的仓库似乎在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就开始了它们的静止。门卫拒绝我们进去看一看的请求，但语气中对我们依依不舍，也许因为触目所及的一切都太安静了。他畅谈这个仓库以及他本人的历史，句子都是逗号，不便打断，当他稍微靠近一点时，我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

“以前这个火车站，它是通的嘛，货物它放在这里就方便；

“货物有外贸有内销，内销的主要就

是茶叶，就是茶叶；

“我们集团也不只做货运，像预制菜啊，仓储物流啊，还做电商。多元化经营嘛。对对对。老板还在国外买了个农场。

“这个岗位，说句不好听的，假如说仓库起火了，那货品价值很大的，说句不好听的，责任很大。”

他讲到他来这个集团已近20年，他做过哪些岗位，在这个岗位上共有三个人，他们两班倒。另两个人春节休假了，最近都是他一个人。元宵过后他也准备回老家，那时他的两个同事就回来了。

谈兴正浓的时候，院子里远远地，一只被拴着的拉布拉多犬发现了我们，吠叫不止。他对我们做了个抱歉的表情，转身向它，也不说话，只是笔直地伸出手臂和手指，遥遥点住。犬声停歇。他又转向我们说，这不是他的狗，是客户养在这里的。

“菜园子”

但石围塘界碑距离还有点远。它在洞仓石路，找路的时候我们绕远了，绕到了葵蓬岗、五眼桥，足足绕了一大圈，看了大量的水域。

天气很冷，寒冷加重了宁静，让这里更像一个异度空间。河边一些古老的房子，建筑风格像渔家的吊脚楼，是吊脚楼和筒易窝棚加农家院的集合体，有几家甚至升起了炊烟，很可能是用柴火做饭。炊烟更增添奇幻。

根据资料上的启示，这块界碑就在洞仓石路永宁街12号向内，一块菜地里。而且，整个碑身都被埋在地下，仅余一个头部露出地面。我们往江边的巷子里的人家走，有很多的菜地。这怎么找呢？

同行的江老师嘴里念念有词，永宁街永宁街，永宁街12号向内。当大家都两眼放空，他一个人远远走在前面，左顾右盼。突然他猛地打开一个木栅栏门，拧开铁索，大喝一声：“找到了！”

说实话我半信半疑。看错了吧，呵呵。怎么还能用一个破门把这界碑和周围变成自家的菜园子？再说这菜园子它菜园我也不答应，就几株不成气候的苗子，一棵香蕉树看起来不像是能结果的。就这个样子还需要弄个门干什么？地上还全是碎砖乱石，一定是把某块石头看成界碑了吧？

果然江老师有点迟疑：“噢，等一下，等等等等。”很显然他看错了。

我暗暗窃喜。我就说不好找嘛。谁知江老师又大喝一声，声音甚是喜悦：“没错！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大家兴奋疾奔，江老师在我们的恭维中顾盼自雄，仿佛那两块界碑不是他发现的，而是他发明的。

那块被埋了整个身子的界碑在一堆羸弱的青菜、健壮的野草、凌乱的瓦片碎砖中，冒出了它的尖头，还有一个“市”字。——根据我在南激村的经验，地底下还有七个字：区界石毁窃严究。

边境

后来有个村民背着手过来，看样子他是这块不成样子的菜园的使用人。

据他所说，这块界碑原是在河岸人家家里，经过“一河两岸”的政策，这些河岸的房子都拆除掉，这块界碑才露了出来。



笔会

本文配图均 陈思呈 摄

更多图文请移步“文汇”App和“文汇报”微信公众号

序跋精粹

时光的漩涡与回澜

胡晓明

四十一年前，我跟吴家荣兄好不容易在四十多名考生当中脱颖而出，成了安徽师范大学首届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祖保泉、方可畏、严云绶、周承昭四位教授联合组成强大阵容的导师组，家荣成为我的师兄。我们于1983年至1986年间，一同上了祖保泉教授的《文心雕龙》课，严云绶老师的文学理论课，选修了文秉模老师的西方哲学史课等，我们也同住一个寝室，有三年的朝夕相处岁月。家荣兄几岁，性情温和，为人友善热情，治学认真踏实。这本书是他的第二本文学随笔（本文是吴家荣《岁月微痕》序，安徽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除了个人记事，更多的内容是对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的一些思考。家荣教授的研究偏于当代小说与叙事文学理论，偏于中西比较、当代美学。他的一些专著已经证明了他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辛勤探索，有独到的见解。这本随笔集则以轻松漫谈的文笔，留下了他四十年文艺学岁月的学思痕迹，有助于完整了解他的学术思想。

然而读他的这本随笔，更多是勾起了我四十年前读硕士的记忆。虽然我们同一届，但家荣兄的方向与我不同，专治当代文论，而我治古代文论。这一区分，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因为，我当时对于学习文艺学，内心产生了一大危机。虽然我在其他文章里写过，但今天仍有一些新的想法。愿借着为家荣写序的机会，将往日之所思与今日之所感，再作笔谈，就正于家荣兄，也算留下岁月流波所漾起的一点涟漪。

我当日思考以及至今仍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即：究竟

什么是中国文论？

我当时有很大的困惑，当年如走马灯一样流行的西学，在学术界尤其是文论界最为惊心动魄，对中国当代文艺思想有颠覆性的极大冲击，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潮此起彼伏，泥沙俱下。一方面是新鲜生猛，给文学界甚至思想界，带来震动，不断有启发与灵感，对于冲破那些陈旧的僵硬教条，毫无疑问具有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然而，我的导师组的几位教授似乎对此不加以理会，他们开的阅读书目和上课的讲义，多半还是多年来积累传承的一套。这不免使我感到，芜湖这座安徽江南小城，既从容淡定，又闭塞隔世。

另一方面，如同大浪淘沙的这时代大潮，对于中国文学，到底能够沉淀多少建设性的思想与理论？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思想传统、文论传统可以消化、把握，可以接得上的东西呢？我当时对学习文艺学，越来越产生了一种困惑，那种同侪危机，仿佛每天的食物在经过了一番火火猛猛之后，才发现能够真正入味、入心的东西毕竟太少。日常读书写作时的浮躁不安情绪就渐渐地起来，此起彼伏、飘

游东西的观念，究竟要指向何方？况且，理论的东西多了，人与文皆容易空，浮泛、空洞，好像缺少有扎实的文本内容的东西留下来。我那时已接触了熊十力的书，接触了新儒家的思想，开始怀疑八十年代如“五四”一样越来越激烈的反传统，是不是应该停下来冷静想一想：古代中国自己的思想，究竟是不是那样一钱不值，要在八十年代反传统思潮当中完全被废弃掉？这是我对文艺学的最大困惑和危机感。

我的导师组给我拟定了一个阅读书目和培养方案，我一看，全是现代文艺学的书目，并没有我想要学的古代文论。我就去跟方老师商量，说我是来学古代文论的，这个书目可能适合我的师兄吴家荣，不适合我。那天晚上，我去找方老师之前，我在心里面其实已经做了决定，那就是：要按照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标准来读书，读最重要的书，古代的经典。其实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并不是古代文论，而是西方文论，我在本科时也读了大量的翻译过来的西方文论的书，但是我已经有有些厌倦了那五光十色走马灯式的外来理论，我决定要读中国的东西，从中找出一条路来。这

很有点狂，当然跟我的启蒙老师赖高翔先生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我决定不完全按照导师组开出来的那个书目来读书，我在心里想，如果读了三年的硕士，没有拿到硕士学位还是次要的，没有好好地读几本重要的书、自己最想读的书，才是最可悲的。所以我决定按照我自己的目标，好好读三年书，至于学位，那并不重要。

这里讲的“没有拿到硕士学位”，是指当时教育部还没有将安徽师大的文艺学硕士授予权批下来。所以我为了转方向这个问题，专门去找方可畏老师谈，他是导师组组长，我把他们给我的书目几乎否定掉了，自己提出一套偏重于中国古典文论的阅读书目和读书计划。方老师相当宽容，不仅没有批评指责（这是这个有人文传统的老学校的大气），反而让我根据自己的读书规划去写读书笔记。于是我的研究方向就跟家荣的不同，他偏向于现代文论，我偏向于古典文论。三年后，我的硕士论文《唐代意境论研究》，获得了答辩委员会主席蒋阳先生的好评。我记得他的评议书第一句话即说：“这是近十年来我看到的最好一篇硕士论文。”此外，

加上我硕士毕业第一年在《文学遗产》头条上发表的论文《传统诗歌与农业社会》，算是为当初的选择，画上了一个较完满的句号。

但是今天我们来整个古代文论学科问题，我又有不同的思考。经过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沉淀，中国古典文论无论在文献的整理、观念的深入、体系化的探索和批评史的重建等方面，都做出了毫无疑问的成绩，做出了对得起这个时代的贡献。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地有了自己的文学理论、自己的批评框架，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来书写，渐渐摆脱了西方文学理论框架的影响，尤其以罗宗强教授的文学思想史、王运熙教授的文学批评通史以及吴承学教授的文体学为其中的重要代表，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现象。但是不能看到，四十年之后事情似乎又产生了一个偏向，大家都去做还原式的批评史研究，都去重新整理，发掘古代的资料，把中国文论变成了一门较为高冷的古典学，变成了博物馆里的东西，“中国文论”的身份又发生了一种令人怀疑的尴尬：它究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还是中国古典文论？如果包含后面的话，那么，我想我们还是

在这里，边境是一个比喻，具体的说法就是“住在旧思维和新体悟之间”，是中国人，看得见两个世界，“那片未知的神秘之林始终在前方数米之处，你必须轻装上路才赶得上，你得保持移动、变化、灵活”。

我有点嫉妒，她在我之前把这些话说了出来，让我只能照抄，因为我也是这样想的。

以前我尽可能地接近过一些边境，比如丹东宽甸的绿江村，过了鸭绿江就是朝鲜，比如呼伦贝尔的奇乾，过了额尔古纳河就是俄罗斯，比如在喀什米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色日克塔什村，过了山头就是巴基斯坦。但是，那里距离真正的边界线，其实还有一些距离，只不过，想象是无所不能的，我需要的是能激发想象的地点。

国家、城市甚至一个人，都有它（他、她）的边境，如果用在一个人身上，边境像个动词，像人生的扩张。

即便不能到一个国家的边境去，那就到一个城市的边境去吧。这就是我对生活妥协之后的野心。

时间的边境也是迷人的。一年将尽，另一个年份开始了它陌生的书写。一个季节变浅了，另一个季节部分地覆盖了它。从一个班级离开，从一个学校离开，从一张办公桌离开，从一个房子离开。到另一个区域去，人生开始了另一个数字。在这些时间的边境，都发生过一些什么，那是我们不可告人又心照不宣的。

写于贵阳孔学堂，2024年处暑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